

学术女性主义基础课程

阅读文选

(上册)

天津师范大学跨界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培训基地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2005年9月10日

目录（上册）

1. 导论：谈到妇女学（玛丽莲·鲍克塞，余宁平译）	1
2. 建构新的知识领域（玛丽莲·鲍克塞，余宁平译校）	4
3. 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 （盖尔·鲁宾，李银河译）	16
4. 社会性别机制（塔里萨·劳里提思，李素苗译）	39
5. 纯真知识的终结（珍尼·芙雷克丝，林郁庭译）	55
6. 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桑德拉·哈定， 戴黍、王学风译，王宏维校）	63
7. 妇女学在中国高校的发展：研究、课程和机制（杜芳琴）	77
8.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89
9.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101
10.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02

导论：谈到妇女学

1994年1月，美国历史学会旧金山会议上，有人问一位刚刚做完发言，报告并演示十九世纪后叶改革者“上演贫困场景”的年轻教授，他是如何从传统的研究福利国家社会史方法转变为运用文学借喻和表现手法的。思索片刻后，这位年轻教授答道：“我想，这一切都是从妇女学（又译“妇女研究”，在本书中统一译为“妇女学”——译者注）开始的。”¹

什么是“妇女学？”它又是如何影响这位年轻学者的？这个始于1970年，由当年的一个妇女学中心，发展为今天的六百多个，拥有成千上万名实践者（英文“practioner”泛指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此处指所有以各种方式进行妇女学方面的事业的人，下同——译者注）和数万门课程、学术事业的起源是什么？妇女学的目标是什么？它的学生和教师是什么人？它的课程、学科和学位的内容是什么？它如何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妇女学的基本思想和阐释、研究和教学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妇女学倡导者和批评者对它的褒贬究竟有多少真实性？谁在为妇女学说话？我们是否应该将它当作单数，象历史学和社会学一样？学术界人士——大学教员、尤其是领导层的管理人员应该怎样对它作出回应？妇女学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过什么影响？它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进程有何重要意义？

这本书正是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回答许多其它关于妇女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与现状问题。本书对妇女学实践者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目标进行了调查；对全美国各种高等教育机构中妇女学的现状地位进行了调查，以评估其优势和缺点。同时，本书回顾了自1969—1970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第一个妇女学系成立以来，近三十年的女权主义学术成就，教学及学术倡导。

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本书将妇女学看作美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妇女为获取该领域平等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关于妇女的研究走过漫长的道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巴黎就曾出现过妇女学的雏形。本书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妇女学，尽管它不是第一个跨学科的新研究领域——远非如此——但它反映了学术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立项，这些机构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吸取能量，为美国学术界带来新的理性观点和新的研究力量——那些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于早几十年或几百年前领导美国高等教育的历代传统学者和学术领导人的新人。同时，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属于一个更伟大的运动，这就是为建立新知识领域、新的教学和研究方法的运动。本书提出，妇女学不仅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新面孔、新视角和新方法，妇女学还为高等教育重新引进了许多非教会学校所缺乏的道德探询。由于它结合当前的趋势和对教学、研究、教育以及当代生活特有的关注，所以妇女学已成为全国各地各类高等院校改革的强大力量。

妇女学已改变了许多机构和个人生活的轨迹。尽管在七十年代，高等院校管理层普遍认为：妇女学只不过是一种学术时尚，它会随着当前的女权主义波浪一起消失。但它直至今日依旧蓬勃发展。早些年，由于学生对妇女学的强烈兴趣，弥补了其它文科和社会科学专业的生源滑坡，也许，促使高校管理层为新课程提供资源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学生对妇女学课程的兴趣和选修妇女学课程的人数，其次才是学术会议论文数目，加上研究生和设计第一代妇女学课程的年轻教师们的强烈呼吁。到第二个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妇女学已经成为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文科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妇女（和一些男人）撰写博士论文或求职的首选课题。这些学者——许多学术界的新人以及一些权威的学术界前辈——使用“主人的工具”²开创了学术活动和教学的新领域，她们身上焕发出的学习热情铺就了妇女学的学术天地。

妇女学的爆炸式迅猛发展，也反映了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员变化和机构扩增。到了八十年代，女性在学生中的总数已超过男性，并且在许多高校，特别是文科的教学科研中，占据重要的比例。不论她们选择什么专业和目标，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都迫切希望学习重新认识自己的新方法，在教室和图书馆到处都可以见到很多女性的身影，她们寻求新知识、寻找新视角。她们发起了“首次妇女大联合，群策群力地质询和改变关于性和社会性别的定义。”³ 共同一致“吻合运行”的研究预期推动了这一时期学术期刊和专业团体的成倍增长，也为妇女学

构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9 讲述了妇女学对课程设置的深层介入，讲述了妇女学怎样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关注影响当代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各章都将对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人士近期提出的批评进行总结思考。这些学术界人士有来自妇女学内部的，也有其它专业的研究人员。非学术界人士则包括女权主义者和非女权或反女权主义者。批评的形式包括严肃的学术论证和媒体的攻击。

妇女学致力于女权政治这一问题，激发了积极的支持，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重复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提出的著名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我讲了女权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它在学术机构中的作用。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功能转变是我关注的重点，这种转变使上大学对大批“非传统的”学生人群产生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成为必须。为了鼓励这批学生入学，吸收私人 and 公立基金的各大型金融资助机构向他们打开了大门学什么和应该教什么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并导致一些重要会议的召开，就学生的学习成果，新的考核手段，重新认识教师的作用和新的责任判定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于那些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投入时间、精力和资金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极有正面意义的发展。但是，还是缺少了一些什么。除了有时出现的一些惋惜当代学生的议论，说他们不象早几代学生那样关心文学，只注重就业，很少有人注意，学生不同了，对现有的课程内容产生了哪些影响。在这里，我要同贬低这些新学生兴趣的艾伦·布卢姆们唱反调，我要指出证据，说明这些学生——特别是那些奔妇女学课程而来的大批学生，她们创造了被佩奇·史密斯（Page Smith）称为“传统大学内部的女权主义武装阵营”——追求的正是只有开明的文科教育才能给予的：通向“更美好、更人道、更高尚社会”之路。10 他们在妇女学这里找到了这条路。

最后一章，探讨评估了妇女学在美国高等教育演变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其他机构变化所起的作用。根据思想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述，我认为：妇女学坚决主张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回归，向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非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发出挑战。这一道德目标的回归，要求重新组织学院课程，重建机构体制，将妇女历来关注的关心、关注和关联问题，11 同新的有关妇女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拓宽范围和深度，改变视角。最后，我对妇女学在学术殿堂中的未来——这个未来毫无疑问地包括高等教育之越来越女性化——提出了一些设想。

随着妇女学建系的成功，这一代学术女权主义者的劳动成果不会再遭遇母辈们的命运。艺术家亨里·埃特（Henriette, artiste）是一位法国十九世纪的妇女，最近才被美国历史学家发现。从此不会有研究者惊呼，“什么，亨里埃特，有这样一段历史，但却没有人告诉妇女这些事情。”12 妇女学系或妇女中心的存在，大大减少了这一代女权主义被其它更为公众关注的问题所淹没、排挤、同化或遮蔽的危险。过去，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人们太容易相信，妇女的权益比起其他人的来说似乎不重要，或她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或她们已经承认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感谢妇女学，两性平等这一长期历史任务将仍然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妇女学将为我们大家的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新意，就是以下各章要探讨的内容。

余宁平译

说明：本节是玛丽莲·鲍克塞《当妇女提问》一书的导言，下一节是该书的第二章，全书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构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9 讲述了妇女学对课程设置的深层介入，讲述了妇女学怎样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关注影响当代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各章都将对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人士近期提出的批评进行总结思考。这些学术界人士有来自妇女学内部的，也有其它专业的研究人员。非学术界人士则包括女权主义者和非女权或反女权主义者。批评的形式包括严肃的学术论证和媒体的攻击。

妇女学致力于女权政治这一问题，激发了积极的支持，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重复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提出的著名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我讲了女权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它在学术机构中的作用。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功能转变是我关注的重点，这种转变使上大学对大批“非传统的”学生人群产生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成为必须。为了鼓励这批学生入学，吸收私人 and 公立基金的各大型金融资助机构向他们打开了大门学什么和应该教什么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并导致一些重要会议的召开，就学生的学习成果，新的考核手段，重新认识教师的作用和新的责任判定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于那些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投入时间、精力和资金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极有正面意义的发展。但是，还是缺少了一些什么。除了有时出现的一些惋惜当代学生的议论，说他们不象早几代学生那样关心文学，只注重就业，很少有人注意，学生不同了，对现有的课程内容产生了哪些影响。在这里，我要同贬低这些新学生兴趣的艾伦·布卢姆们唱反调，我要指出证据，说明这些学生——特别是那些奔妇女学课程而来的大批学生，她们创造了被佩奇·史密斯（Page Smith）称为“传统大学内部的女权主义武装阵营”——追求的正是只有开明的文科教育才能给予的：通向“更美好、更人道、更高尚社会”之路。10 他们在妇女学这里找到了这条路。

最后一章，探讨评估了妇女学在美国高等教育演变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其他机构变化所起的作用。根据思想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述，我认为：妇女学坚决主张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回归，向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非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发出挑战。这一道德目标的回归，要求重新组织学院课程，重建机构体制，将妇女历来关注的关心、关注和关联问题，11 同新的有关妇女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拓宽范围和深度，改变视角。最后，我对妇女学在学术殿堂中的未来——这个未来毫无疑问地包括高等教育之越来越女性化——提出了一些设想。

随着妇女学建系的成功，这一代学术女权主义者的劳动成果不会再遭遇母辈们的命运。艺术家亨里·埃特（Henriette，artiste）是一位法国十九世纪的妇女，最近才被美国历史学家发现。从此不会有研究者惊呼，“什么，亨里埃特，有这样一段历史，但却没有人告诉妇女这些事情。”12 妇女学系或妇女中心的存在，大大减少了这一代女权主义被其它更为公众关注的问题所淹没、排挤、同化或遮蔽的危险。过去，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人们太容易相信，妇女的权益比起其他人的来说似乎不重要，或她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或她们已经承认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感谢妇女学，两性平等这一长期历史任务将仍然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妇女学将为我们大家的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新意，就是以下各章要探讨的内容。

余宁平译

说明：本节是玛丽莲·鲍克塞《当妇女提问》一书的导言，下一节是该书的第二章，全书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章 建构新的知识领域 重新思考世界与妇女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肯·克西(Ken Kesey)在加利福尼亚创办的“快乐玩笑人”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在纽约创办的“精神探秘联盟”这两个组织对自己的评估,他们自认为是“两个极其神秘的学会,举世无双,为参与最奇妙的人类意识实验而设计的全新组织。”¹为了正确评价妇女学的远大理想,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妇女学产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幻想尚未破灭,年轻而充满希望的时代。美国的富强成功激起了各种梦想,其中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成为梦想的中心。做梦者中有许多是妇女。美国女儿开始大批走进大学校门,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在比例上超过了美国男儿。这些走出家门的“男女合校大学中的女生们,”有一些加入了啦啦队,而另一些则投入了更有意义的活动,与她们的兄弟或男朋友们一起参与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运动——公民权利运动、新左派运动、自由言论运动和学生权力运动,以及“新大学”运动。最终,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积累的经验,使美国女权主义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得以复兴。

由于女学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政治斗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些人注意到她们在运动团体以及社会中所处的二等公民地位,并开始对此提出质疑。²到了1965年和1966年,在西雅图、新奥尔良市、芝加哥和纽约市分别出现了精心设计的有关妇女的课程。这些课首先开在“免费大学”和名牌高校,它们的共同之处,除了中心话题相同外,还有一个共识,即认为妇女学是一种教育策略,能够导致“意识和知识领域的突破”,以“改变个人、组织、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整个社会”。³知识就是力量,新赋权的妇女能够纠正(男人制造的)社会的错误。她们不再是“男女合校大学中的女生”,她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教育。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是妇女学的生身父母之一,那么另一个生身父母就是积极参与改革的行动主义。积极行动主义大约始于1969年,目标在于改造众多学术性团体组织。在人类学、经济学、历史、文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包括科学和工程学的众多领域,妇女们开始组织各种核心小组,把女性的专业兴趣置于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和地区性的会议日程中。⁴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1970年的年会上出现了一个专题讨论小组,名为“超越生殖器:解析历史学专业中的性别歧视”,这在以前的美国历史学会活动安排中是从来没有过的。⁵小溪流马上变成了一股大海般的潮流;这种海水般的变化从1996年由美国历史学会成员选举的官员名单中可见一斑:十三个学会成员中有九名是女性,并且继承当前主席职务的当选人也是位女性。在这个享有盛名的组织112年的发展历史上,在1987年法国女历史学家纳塔丽·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当选为该会主席之前,只1943年战争期间有一位女性曾任过该职务。(在此之后),当选该学会主席的还有1993年的路易丝·蒂利(Louise A. Tilly),1996年的卡罗琳·沃克·拜纳姆(Caroline Walker Bynum),1997年的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在1987年到1997年的十年间担任主席的这四位女性都是由学会成员在全国性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而且她们也符合这一崇高的荣誉。其它学科的领导层也经历了变化。专业内的核心小组不仅推动了妇女的任命和进步,同时还间接地促进了妇女学的发展,因为许多女学者都把她们的研究和教学技能转向了研究妇女。

当妇女们在全国性领导岗位上日益显现的时候,在基层,以及全国各个校园里,妇女学也丝毫没有松劲。妇女学中心四处开花,课程数目激增,选修妇女学课程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一份美国教育部的全国性纵向调查报告表明,拿到妇女学课程学分的学生从1972年的6%增加到1993年的12%以上,比其它跨学科领域都要多。⁶这个报告还将妇女学列为包括商业、计算机科学和相关的工程学领域、大众传媒,以及招待和娱乐研究等在内的这一时期上升课程。因为妇女学课程主要分布在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它社会学科,这些数据表明了学术女权主义对当前美国大学文科发展的重要贡献。

妇女学的学生们究竟在学什么呢?本书无法将所有名为“妇女在……”领域,或“妇女与……”学科的众多课程(这些课程一般都由各个系开设,作为常规课程的一部分)一一罗列加以评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了不少,批判传统课程,显示女性学者对学科教学的影

响。⁷然而,基于有二百多所院校报告说他们可以授予妇女学专业学士学位,且在1992到1993年已经授予了四百多个学位,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典型的本科学位课程内容。根据全国妇女学协会(NWSA)1991年的一次调查——此次调查结果由全国妇女学协会与美国大学联合会(AAA,现在称为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AACU)共同出版——显示,妇女学专业一般要求完成三十五个学时,其中包括一门导论课(通常称为“妇女学导论”);几门妇女学本系或其它传统学科的选修课(两者比重几乎相等),一门“顶点”课程,可以是毕业班小组研讨课,也可以是实习或独立研究课。近40%的专业规定女权主义理论为必修课,几乎相同比例的专业要求有一门将社会性别和民族、种族、文化差异等视角相结合的课程。全国妇女学协会和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所调查的妇女学项目中,有95%都设置了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课程,反映出学术女权主义者把有色人种妇女纳入妇女学专业,并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特点的强烈愿望,以及她们对文化多元化的敏感性。此外,另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妇女学项目(72%)要求学生必须选修妇女学以外的课程。这是妇女学的另一个特点。在一个典型的妇女专业中,大约一半课程来自社会科学,另一半来自人文科学。⁸

在教师所采用方法的多样性上,妇女学与其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其它学科领域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建议为导论课设定相同的内容是愚蠢的。许多教师仍然要求学生阅读她们自己根据本人学术背景、学术兴趣和政治洞察力及所在院系对课程设置的要求和预期而制定的阅读材料。不过,从以下三种最常用课本中,我们可以了解妇女学可能选用的教材类型。

《妇女: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是第一本妇女学导论课本,它从1975年第一次出版,到1995年第五次再版,其中的经历反映了妇女学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存在。1968年,该书的主编乔·弗里曼(Jo Freeman)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当时她受到感动,开始调查因一名女教授被解雇而引起的校园静坐事件。在写一篇大学妇女史报告的过程中,她发现了由索弗尼斯巴·普雷斯頓·布雷肯里奇(Sophonisba Preston Breckinridge)开设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最原始的妇女学”课,内容是关于妇女的法律和经济状况,之后,她在学生的要求下,开设了一门没有学分的“布雷肯里奇纪念课,”讲授相同的内容。她的书就是在那门课的基础上构思发展起来的。她回忆说:“这也是对静坐的回应”。⁹

起初,弗里曼接触了几家东部出版社,被拒绝后,她在妇女学迅速发展的西海岸找到了出版商。《妇女: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的第一第二版分别销售了大约五万册;接下来的三版(最新的一版是1995年)总销售数达到了约二十万,使它成为可能是使用最广泛的妇女学导论课本。在过去的几年中《妇女:一个女权主义的视角》经过了大量修改;第一版中只选用了弗里曼原先课程读物中的两篇,其它的文章是通过女权主义传媒刊登的大量征稿启事征集来的。书的观点反映了解放运动的立场:“本书反映社会控制视角,”弗里曼在第一版导言中这样写道:“它反对那种认为在社会设定性别角色并对那些偏离这些角色的人们进行惩罚的条件下,男女两性可以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的观点。”弗里曼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她按照影响妇女生活一系列循环圈来构思这本书,从妇女的身体、家庭、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开始,继而将笔锋转向工作场所、形象、社会机构,最后以历史的和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结束。有人谴责女权主义运动忽视传统上妇女所关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读一读这本书中的一些与今天的情况密切相关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美国的日托托儿所的历史与发展”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令人吃惊的贫困儿童现象”以及当代社会对此缺乏关注的程度。¹⁰

弗里曼的第三版基本上是一本全新的书,只有四篇文章(主要是历史性的)是保留文章。到了1984年,她已经能够依靠不断增长的女权主义研究资源。在基本保持同样框架的情况下,她增加了几篇反映更大范围女性身份的文章。她认为第一版与第三版的最大区别在于,“减少了题材中的作者个人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数据。“我在编辑第一版时删去了许多修辞性的和非事实推理。而第三版的文章有几篇是如此地干涩以至于我都想加入点修辞了。”¹¹

不出所料,1989年的第四版理论占了很大比重。第六章中讨论的许多女权主义理论都是那十年中产生的。弗里曼在编辑第四版和1995年的第五版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她发现,

如今学术资源确实很丰富，但是作者们反而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第五版的文章实际上只是对已经发表的论述加以评论而已”。从积极的方面讲，这里也有多样性的痕迹。虽然弗里曼的任务没变，仍旧是分析妇女的状况、提供有关妇女生活的数据，并且用“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视角”来阐释这些数据，但是她“不太可能”找到前几版中的那种统一的观点。更贴切地讲，最新的也是内容最多的最近这一版的副标题也许应该是“多种女权主义视角”。¹²

视角的多样性也是另外一本常用课本的基本特点。明确作为妇女学导论课的基础课本，《妇女的现实，妇女的选择：妇女学导论》出版于1983年，由在纽约市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几位教师编写。编写者们表示，希望“这本书的使用将推进妇女学导论课的规范化。”该书的出版受到了全国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亨特学院当时的院长唐娜·沙拉拉（Donna E. Shalala）在她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称之为“值得用焰火来庆贺（的书）”。¹³

作者们同样采用了重点环节描述的框架，从个体妇女扩展到家庭，乃至社会，从整体上揭示了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妇女的生活现实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并提出了几种以妇女为主的“有助于缩小这种鸿沟”的方法。由于她们认为，妇女学如同她们写书一样，是集体性学习，并且妇女学的教学是由“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组成，因此作者们对如何使用代词费了很大的劲。她们究竟应该把妇女——她们的主要题材，即也是对象——称为“她们”还是应该与所有妇女们站在一起，用“我们”？她们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改，不断地思考使用哪一个代词更好，可总是发现，不是“拗口”，就是“虚假”，或是“无礼”，甚至是“愚蠢。”最后她们决定采用第一人称，“努力为所有妇女说话，尽管其中有不少犹豫”。她们希望这种选择将鼓励读者们“从妇女的角度，从‘我们’大家的观点出发，用我们的多元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把妇女当作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¹⁴

在“界定妇女”之前（第一部分），作者们介绍研究领域：“妇女学不仅仅是简单地研究妇女，而是将妇女自己的经验置于研究过程的中心加以研究，它研究整个世界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类，研究的问题、分析和理论直接来自妇女的经验。”因此，妇女在这里不仅仅是以形象、象征、男人设计的哲学和科学理论中出现。“界定妇女”的每一章节都列出了妇女做出的创造性工作，或女性对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问题及信息的以女性的解释。全书覆盖面之广——从《所罗门之歌》（*The Song of Solomon*）到朱迪·芝加哥（Jud y Chicago），从生产的过程到妇女参与世界政治的形式，书中所浓缩的大量信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该书还有许多整页的有关妇女和妇女工作的插图，它确实够得上沙拉拉的赞誉。因此它的销售量达到三万五千多册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⁵

考虑到一些合理的批评，指责一些妇女学实践者将“政治正确性”与政治抱负无限扩大，到了可笑的地步——发誓要同“身强力壮主义（ablebodyism）”、“成人主义（adultism）”、“扮相主义（looksism）”和“身材尺码主义（sizeism）”等“敌人”斗争到底。值得指出的是，亨特学院的选集避免了这些矫揉造作、几乎泛滥成灾的新词语症，用温和的词语陈述了自己的目标。她们承认这个领域内存在争议，并且认识到选集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妇女学依然是一个新的领域”，作者指出，“它没有传统的下属分科，没有标准的表现方法，甚至对它的界定也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认为妇女学提供了一个开展“道德和实践两种批评”的基础（着重号是后来加上去的）。妇女权益的伦理因素在许多女权主义的讨论中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¹⁶

第三种向初学者介绍妇女学的方法反映在另一本广受欢迎、最近刚重新发行的课本中，即希拉·鲁斯（Sheila Ruth）的《女权主义问题》（*Issues in Feminism*）。这本书1980年第一次出版，内容包括了作者对影响妇女生活的性别不对称性和“男权制”的形象、信仰和社会机构的评论，还有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最新的或修正主义作者的一些论述。学生可以在阅读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卢梭、弗洛伊德的同时，也阅读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波芙娃，莱昂内耳·泰格（Lionel Tiger）和恩格斯，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和伊丽莎白·詹韦（Elizabeth Janeway）的著作。1977年，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在美国司法界联合会（ABA）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被节选收录在该书的第一版中。十年后，金斯伯格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正如该书的书名所显示的,《女权主义问题》强调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关系以及她们为赢得平等所做出的努力。它同样包含了大量信息并介绍了妇女的著作和用语。鲁斯从许多学科中广泛地选取材料,首先从哲学理念入手。她希望学生在经历“重新评价自己经验导致的震撼”后,能够加入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学习中来,质疑、评价多种反应、探索更多放入模棱两可的问题和未知领域。这本书以美国妇女史年表作为结尾,从1587年弗吉尼亚·戴尔(Virginia Dare)和易洛魁(Iroquois)联邦宪法(这部宪法给予了妇女重要的权力)的诞生到卡特总统1977年创立的国际妇女年全国委员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当年在休斯顿召开的全国妇女大会。1995年出版的第三版将妇女史年表延续到1993年。那一年,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法官。希拉·鲁斯在她的评论中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但是,在最新的一版中,她暗示读者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¹⁷

在所有层次的妇女学的教学中(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探讨),特别是介绍性阶段,教学法原理和课堂活力经常被认为是与课本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在1995年全国妇女研究联合会的全国性会议上,有一个题为“妇女学导论教学策略”的小组会吸引了五十名与会者共同探讨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他们寻求把妇女学与下列问题联系起来:知识的历史及其各个学科领域、阶级与种族问题、女权主义刻板印象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女权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女同性恋者和反男子主义者)、学术标准。如同妇女学重要文本所述,发言者们一致认为,导论课应该以界定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及两者的关系入手,应该评价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通过社会化、家庭、婚姻及其它关系、老年化等来研究女性的生活环节;应该涉及教育、语言、媒介、宗教、法律、妇女暴力、工作,以及女权主义者寻求变化所做出的努力。讨论的组织者意识到了“在每个问题上多种声音的存在”的重要性。这次讨论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可能是反驳了一个共有的成见,即,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妇女学并不是去听取她们已确定的政治信仰,而是去寻求和采用新的视角。几乎没有人自我宣称是女权主义者。¹⁸

导论课可以围绕跨学科妇女学学术成果来建构,也可以将重心放在女权主义问题上来建构。但是,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标准的教材体系,一个划分主次的固定标准,一个“知识基础”?在妇女学领域发展的现阶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部分是否定的。“不,不要让它有!”在回答是否需要一个划分主次的固定标准问题时,东南部的一个公立大学里大部分人是这么说的。然而,同样是这些人,却又都认为,的确存在这样一种知识基础。在调查了从事妇女学和跨学科课程的教师之后,他们确定了妇女学应该包括的五个重要方面:

- 对妇女的系统的、环环相扣的压迫;
- 妇女与父权制间的各种关系;
- 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
- 知识的社会建构;
- 妇女权力和赋权的再界定和重新思考。¹⁹

审视妇女学的课程和学科设置,不难看出,妇女学是一项批判性思维的工程。“我在妇女学中发现的是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它教我不仅对答案而且对问题本身提出质疑”,在东海岸一所公立学院的一位女研究生这么说。²⁰现在,可以公正地说,妇女学质疑了每一种不利于妇女经验的观点,并且,在现阶段,妇女学旗下的好问题远比确定的答案多得多。

正是这种批判性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使弗洛伦斯·豪(Florence Howe)提出将妇女学当作一种特别适合开放型文科教育的合理方法。²¹弗洛伦斯·豪是妇女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妇女学季刊》(1972年创办)的策划者,她现在仍是该杂志的出版人。同样的,美国大学联合会1988年的报告《普通教育的新活力》(A New Vitality in General Education)也肯定了妇女学通过对传统知识提出广泛的质疑,“激发了对准确的提出、分析、综合和理论建设的重视。”²²公共课中包括了大量妇女学课程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在西海岸两所综合大学妇女学课程大纲的管理者们把她们的课程描绘成“公共课教学工作的载重马”。²³

界定范围

然而妇女学不仅仅是丰富文科教育的有效途径，它还采纳了一种研究妇女的特定方法。在妇女学内人们普遍地理解并接受下面这一观点：并不是每一门关于妇女的课程都属于妇女学。有人认为妇女学是为妇女的，也是关于妇女的。它与女权主义的关系通常是有明确的表述。大众媒体，甚至是学术媒体可能会随意地使用“妇女学”这个词来涵盖所有的妇女行为和出自女性之手的作品：《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每周学术新书评论栏目中，把关于“高科技时代的妊娠”的论著和《热心圣人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spiring Saint)列在妇女学的标题下，《旧金山检查员》(San Francisco Examiner)把苏珊·奇弗(Susan Cheever)的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女性照片称为“妇女学不断增长的书架上的一个小脚注”。²⁴在材料如此丰富，且妇女学课程大多分布在传统系科(几乎令妇女学教师没有任何控制权)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哪些课程可以指定作为妇女学，并且可以当作学生完成妇女学学位课程的要求？

要回答“什么样的课才是‘妇女学’的课程”这一问题并不简单。什么内容使妇女学成为一门研究领域？新的学术成果能否在不改变或修正“主流”方向的情况下融入主流之中？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教这门课？如果妇女学可以由任何人——可能是一个非女权主义者——来教，那么这种新的学术成果还是妇女学吗？妇女学教学法及其内容必须反映女权主义者的原则吗？妇女学是否依赖专门的研究方法？那些传统学科中的课程，如它们的题目表明是关于妇女方面的，那么何时才应该把这些课程交叉列入妇女学课目中？是不是关于所有妇女的所有内容都属于妇女学的范畴？这些问题在许多场合一再地出现——在课程和教学法的讨论中，在教员编制和结构、理论与实际的讨论中均有。它们还将在下面的几章中再次出现。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比批评家的思想更开放，在方法上也更多元化。它们反映出妇女学与其它许多多元学科领域一样，需要面对挑战，以及许多棘手的问题。界定妇女学和界定美国研究、环境研究和宗教研究是一样的。由于缺乏自己的全职教师，作为一种规则跨学科课程发现大纲计划的制订、课堂时间的安排和平等的控制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然而对于妇女学，争议趋向于集中在女性视角和课程内容上——从更小程度上讲，是集中于教育实践上。如果人们希望妇女学能结合一个批判的视角，利用新的资源，采用全面的词汇，强调多样性，运用赋予学生权力的课堂技巧，那么在这个层次上讲，并不是每一节关于妇女的课都能做到这些。不管女权主义是如何界定的，至少人们希望对女权主义者权利的伦理维度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意识，但从非女权主义的角度来教授关于妇女、社会性别和女权主义的理论却很少。亚特兰大埃默里(Emory)大学妇女学项目前任所长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Elizabeth Fox-Genovese)曾试图这么做，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克斯-吉诺维斯认为，“妇女和社会性别并不一定要是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其中的意义，如果不总是明确地表示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学的献身精神，就是引入了意识形态偏见的歧途，这种偏见与他们对学术的观点是不相适应的。她们认为，“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方法论”和“女权主义研究”这些提法，对妇女学在学术界(academy)争取平等地位的要求起了负面作用。²⁵

为妇女学界定范围的问题在最近的几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原先由杜克(Duke)大学妇女学系主任琼·奥巴尔(Jean O'Barr)的工作开始，1988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的妇女社会地位与教育项目(the Project on the Status and Education of Women)发表了一份题为“大学课程中妇女研究新学术成果含量评估”(Evaluating Courses for Inclusion of New Scholarship on Women)的调查问卷。据作者说，它的目的不是为排除课程设定基础，而是另有目的。妇女社会地位与教育项目(PSEW)根据以下两个观察，即，“妇女学仍旧相对地没有触及文科领域”，许多学生因此至今仍然在接受与妇女研究新成果毫无关联的教育，提出，组织对课程内容和形式进行妇女研究新学术含量的评估，发表这种评估的指导准则，将有助于妇女研究新学术成果的被接纳和传播。这些问题涵盖了许多内容，比如，在课程的不同方面，妇女是否以主体和作者的身份出现，其频率和覆盖面如何，所用的描述方法是否从个人的角度，以及性别、种族、权力和视角差异的角度。²⁶

在1992年到1996年间，为跨系选修课程制定政策的话题作为一根连线，多次出现在电子

邮件 WMST-L 讨论中。它始于由肯塔基一所公立大学的一名助教提出的一个问题, (主题为“我们是新手”), 后来又试图在妇女学中建立一门副修课程。她写道:“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号召把当前题目中有‘妇女’字眼的课程都包括在内。其他则更关心内容”; 后者希望设立标准, 根据这些标准提交教学大纲审批委员会评价和许可。这些讨论的参加者来自从马里兰州到加利福尼亚, 从迈阿密到佛吉尼亚的四面八方。讨论的结果包括了几套“核心课程”和“辅助课程”的标准, 其中“核心课程”将有“更严格的标准”。绝大部分标准提到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中妇女内容的含量, 是否教学生识别和分析对妇女的传统认定和偏见, 教材是否结合新的女权主义学术成果, 教学方法上是否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一些反馈还包括一个开放性的质疑, 即关于为什么该教学大纲体现的是“一门妇女学课程, 而不是关于妇女或社会性别的课程”, 或者, 从“女权主义或无性别歧视”的观点讲课是否可行。另外一些人则寻求提高对妇女经历多样性的认识。²⁷

巴尔的摩县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UMBC) 妇女学主任和该网络对话的管理者琼·科伦曼 (Joan Korenman) 赞成她所在的系所持的观点。“我们不是要求, 甚至并不希望教员们严格服从某一条狭隘的思想路线, 我们要求所有妇女学课程应该联系当前妇女学的新学术成果, 并且帮助学生理解女权主义视角。”巴尔的摩县大学妇女学委员会要求的新课报审材料包括, 该课程教学大纲, 其中包括所要求的阅读书目, 教学方法简介——所有这些新课程审批委员会对任何一门报审的新课程通常提出的要求。另外他们还提出三个新问题:

1. 课程的中心点是社会性别角色, 妇女问题, 并且/或者是妇女在历史、艺术或科学中的地位或形象吗? 请解释。

2. 课程教材如何反映当前有关妇女的女权主义学术成果的知识?

3. 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门妇女学的课程, 而不只是关于妇女或是关于社会性别的课程?²⁸

本次讨论中没有一位回答者提出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建议。不过, 一些其他学者已经从妇女学课堂是“女权主义者原则的实验室”出发, 提出了女权主义教学模式。她们提出的十三条指导意见包括, 一门妇女学课程应该“只针对妇女问题, 并把妇女当作标准”; 另外, “如果可能的话, 课程的主要协调者应该是妇女”。这种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还包括运用广义上的女性语言作为“有效的教学工具”, 同时创造机会使妇女和男子有部分各自独立的课堂时间。然而从总体上讲, 这些指导原则强调在妇女学教学中应该反映“相互关联的学习”这一目标, 这将在第四章中阐述。²⁹

唯一提到运用这些标准否决过一门课程的是中西部一所私立研究大学, 该大学的教员们声称, 对不同意将一门非女权主义者教授开的妇女课程列为跨系交叉选修课这一决定, 感到“非常舒服”。该系特意采用“妇女的研究”(women's studies) 而不是泛泛的“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 这是因为前者强调了一种女权主义者姿态。然而, 比起试图“排外”的做法, 妇女学中要求“包容”的呼声要高得多。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妇女学中女权主义者女教员中占绝对优势的原因, 与其说是对女性或男性的故意排斥, 不如说是教师的自我选。第二, 许多妇女学系确实包括了由男子教授的课程。

学科与系的问题

交叉选课的问题对妇女学极为重要, 因为妇女学系的课程, 只有很少的受编制在妇女学中心或妇女学系的教师控制。因此, 教育机构的结构和调控, 在决定开设什么样的课程问题上, 起着重要的间接作用——谁来教和教什么——而且可能涉及界定妇女学的内容。教育机构的设置可以带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从妇女学的早期阶段开始——看一看希拉·托拜厄斯 (Sheila Tobias) 在《女性研究 I》中提出的问题就可以明白——新的研究领域的组织建设问题, 显然十分重要。早期的领导者设定的目标是不仅要转变课程和大学, 同时还要转变妇女的生活, 以及文化和社会。因此, 她们认为, 标准的系科结构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根据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参与普及型“自由开放大学”运动的经验, 弗洛伦斯·豪担心, 妇女们可能会“满足于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而放弃将充满活力的运动化为改变整个大学的策略。”另外一种早期的重要声音发自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 (Gerda Lerner) (她后来成为美国史学家组织的主

席),她宣称“包罗所有挑战的妇女学,无法通过一个狭隘的学科重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妇女学理事会起初决定“不建立单独的‘妇女学’系,原因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确认在所有学科的每一个层面中妇女‘地位’的重要性,而不是其‘独有的’特点。”³¹对妇女学成为另一个“贫民隔离区”这一可怕潜在后果,已经有不少的暗示。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1977的一首很有影响的诗中写道:“大学和其他知识机构试图使妇女的经历尽可能不显现,妇女学是一个很少得到资助、被别人居高临下地恩准存在的‘贫民隔离区’。”³²院校组织、资源配置和学术影响的成就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对这些假设重新予以思考。正如小说家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最近所说的,“我在196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对妇女的研究系的建立,因为我觉得它将使妇女更边缘化,并且阻碍我们改变现存的学科。但是我错了。”³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可能只有一个正式的妇女学系,设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然而妇女学系的短缺,可能更多的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由于早期反对“贫民隔离区化”的警告,也不是由于任何反对分离主义的理论观点。妇女学是在长期持续性发展阶段结束后才在高等教育中出现;而且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学生生源急剧下降,学生们纷纷选择进入商业系科,或其它职业领域之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由于有关妇女的课程对广大学生的吸引力才使得那些持怀疑态度的管理者们愿意向它投资,虽然数量很少。这些课程大多是由临时教员和资历较浅的教员来讲授,因此费用很低。当支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计划的一个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因为妇女学课程教员的薪水比别人低,而学生人数却大涨,引起了管理层的兴趣。招生人数为妇女学提供了生机,大部分大学的妇女学都采用了宽松式联合的跨学科课程形式。1974年到1980年间,我作为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妇女学系的系主任,密切地关注但却很少发现,虽然这种频率呈增长趋势,期刊杂志或其它地方发表的妇女学文章作者,说明自己来自妇女学系。

³⁴

这种发展趋势,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很好的解释理由,而且这种趋势现在仍在继续。在大部分大学,资源、奖励和报酬都按系划分。要求建系者强调系规范化的功能——“提供资金的机构只知道‘系’”——和‘系’所拥有的决策权。在从妇女学项目转变为妇女学系之后,一位妇女学系主任声称:“活命主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另外一个存在已久的妇女学中心最近也改为系制,该系的系主任说,她所在的系现在能够超越“东拼西凑的年代了”。³⁵对希望建系的教职员来说,最好的理由可能是需要一个有着共同知识兴趣的学者团体,以互相激励、互相批评和支持彼此的写作。对于大多数在校大学生来说,是得到重视和获得承认的需要,使他们在重重叠叠的大机构中有一个象征性的和实实在在的地方,有一个家的感觉。如果没有妇女学中心或妇女学系,妇女学学术成果的资源可能也不会枯竭——它的源泉几乎是无处不有——但是,它所创造的许多财富可能会处于边缘地带,因为,根据定义,妇女学无法符合旧的、惯用的学科分类。

作为对1990年提出的明确要求的响应,今天,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妇女学是一个系,但网络模式仍盛行于其它地方。根据1995年WMST-L网上公布的信息以及我自己搜集的材料,正式的妇女学系大约只有二十个。不过,随着妇女学实践者们对大学实际情况的了解,妇女学系的数量正在稳步地上升,因为她们发现,大学的资源(特别是教师名额)和奖励(包括终身制、提升和重要的委员会代表名额分配)往往都是以系为单位。建系作为一种适合于长期努力发展的策略现在已经得到了承认。它可以在预算缩减的困难时期时成为安全保障。它降低了妇女学被视为琐碎和无关紧要的危险,比如,一位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最近就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可以花一天时间来探讨妇女问题了。”好像妇女研究只是一个附加的顺带的任务,并无重要意义。建系意味着大家认识到了,实现转变的任务还需要几十年,甚至可能是几代人的研究、教学才能完成,同时它还需要在新知识传播后的意识领域的缓慢变化。

如果系的数量仍然很少,单独给妇女学的终身制教授职位也就很少。这是妇女学面对的一个严重事实。妇女学大部分课程的任课教师仍然是接受的传统学科教育,在传统学科任职,而且是根据所在系的旧有标准被聘任、评估和评价的。很少有大学会慷慨地分配给妇女学中心或妇女学系几个全职名额。由于在不同院校的机关、研究职位和行政职位的确定有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比较也很容易产生误导。然而,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马利兰大学科里奇帕克

(College Park) 学院、圣第亚哥州立大学和南佛罗里达大学, 妇女学系掌握八个聘用方向及其附属终身制。亚利桑那大学(其妇女学最近已经成为一个系)掌握十个方向, 明尼苏达大学预计有相同的数量, 华盛顿大学有九个, 但在这三所大学中都有几个位置是与别的系合用的。有的项目有四到七个, 但许多大学中妇女学单独掌握的职位却很少。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 大部分妇女学项目和妇女学系都还设有全职教员职位。³⁷ 兼职或分职是妇女学项目人员编制中最常用的方法; 一般的项目通常都是由十八名兼职教师分别讲授跨系的课程。编制结构实际上影响了妇女学中每一个学术、政治和职业问题。

建系的趋势可能不仅反映了从改变大学结构这一更为激进的目标退出转移, 同时也反映了妇女学在自身制度化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另外, 以前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妇女学中的教员有选择权, 最近这种状况似乎有所改变。妇女学项目在遭遇反对最小的地方发展最快。几乎无一例外, 妇女学发展的第一步, 就是在不同的系和专业设立将妇女包括在内的课程。有了最低限度的独立财政资源(如果有的话)之后, 成立妇女学中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分散在各个系的课程, 通过交叉冠名(如果可能的话)的方法, 把它们称为妇女学课程, 同时建立一个教师委员会(通常也有学生、职员, 有时也有社区代表), 寻求能够作为一项跨学科项目得到认可。

但是制度结构不仅仅是政治、资源和机构权力的问题。它同时也包括重要的知识和专业的涵义。史密斯学院的前任院长吉尔·克尔·康韦(Jill Ker Conway)在回顾多伦多大学学术女权主义最初发展时, 回忆了她曾反对在妇女学中设置独立课程的理由:

我认为, 同意把这些希望研究妇女经历的人——她们几乎全是妇女——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核心专业中赶出去, 到资金不足、在大学支出分配的过程中没有赞助者的妇女学系孤军奋战, 并且, 妇女学系学生人数之多, 使得她们经常无法在研究成果上与更传统系科的教授们相竞争, 这些从策略上讲都犯了基本的错误。这种做法导致了我认为是关于“女权主义”的错误思想, 或过度“温情式”的教学风格, 作为缺乏货真价实研究的借口。我认为, 那种将任何直接公开的批评排除在外的过度“温情式”的教学法同百依百顺的育儿法一样危险。³⁸

虽然康韦点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即早期(妇女和少数民族)教授们有时要面对大量为学生服务或为学校和服务的重望, 但是她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围绕“自治还是融合”争论的更重要的问题。传播新学术成果这一问题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 它要求做出决定, 是把妇女学内容全面引入课程设置, 在所有课程中传播妇女学, 还是设置独立的课程, 包括(合适的)概论课、专题课和研究讨论小组课。另一方面, 可以在带有传统系科名称的课程和妇女学专门课程之间有所选择。主张后者的人们往往不是以“系”而是以“学科”来论证。对妇女学能否赢得学科地位的关注以及颇有吸引力的关于学科界定之争论已经引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

“妇女学是一门学术性学科吗?”, 这个问题是 1979 年全国妇女研究联合会(NWSA)第一届年会中一个小组的讨论题目。这一问题引导了八十年代的讨论, 成为那十年的讨论主题, 并且在九十年代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参看第三章关于妇女的研究是否应该成为以争取“主流”为目的的推论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 独立的妇女学项目无异于一种封闭的少数人领域, 这会阻碍改革高等教育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 使妇女学成为局限于自己系里面的一门学科, 甚至会成为一种当代家政学(一个世纪前, 家政学的产生也是受女权主义的影响)。妇女学应该成为改变所有知识的一个平台。历史学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认为, “在长时间内, 妇女学将不必从一个独立的视角出发, 因为它所提出的视角将成为一个普通的视角, 也就是说, 一个妇女也象男子那样被承认的视角。”科特认为“长时间”的概念是“大约五十年”。

另外有人指出, 如果没有全职的学者献身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妇女学将永远不会发展到获得普遍承认的新状态。历史学家桑德拉·科伊纳(Sandra Coyner)觉察到, 如果完全抛弃多学科的概念而象其它所有学科那样采用学术性学科的身份, 这将能使新的学术成果获益更多, 她指出, 其它学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并不比妇女学更“纯”。她对听众说, 就称我们自己为一门学科吧。“就用这些词。当人们问你的学科时, 就说是‘妇女学’。把其他的统统称为‘其它’学科”。而一门学科的最合理的行政单位当然是系了。科伊纳希望看到旧的学科界

线能够被跨越,使教授们可以讲授有关“美国历史中的妇女,妇女心理学,家庭,妇女学概论课或小组讨论课”等课程。未来大学教授的培养应该将妇女学博士学位包括在内。⁴⁰

跨学科视角对妇女学的重要性,从大多数妇女学项目为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名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课程的抽样包括如旧金山州立大学提供的核心课程,所有这些课程都要求包括来自多种学科的视角:

WOMS 200 妇女:基本问题

WOMS 301 群体中的妇女

WOMS 302 解释妇女的经历

WOMS 400 批判分析和女权主义研究

旧金山州立大学开设的其它多学科课程还有

WOMS 552 女同性恋者的生活和思想

WOMS 591 衰老:老年妇女

WOMS 611 女性性文化:社会 and 理论视角

WOMS 630 母权制/父权制

WOMS 750 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和性文化问题

以及许多有关不同民族妇女问题的课程。在讨论这些课程时,常用到“跨学科”一词,也许,用“多学科”一词替代它可能更具有描述性。与这些词同时存在的,是称妇女学为一门学科的提法。

讨论完妇女学既象又不象其它“学科”后,琼·奥巴尔总结说,它“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在更进一步研究后,这个看上去自相矛盾的陈述,既反映了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不同系、不同学科之间的混乱状况,又体现了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科目成为学科的演变过程。许多被称为学科的区域,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是多元和多样化的。比如,在人类学、生物学和古典研究专业,都可以见到这种现象。对于妇女学来说,结构问题既是实践性的,也是思想性的。马里兰大学科里奇帕克学院的克莱尔·摩西(Clarie Moses)认为,她们学院的妇女学保留了系和项目的双重地位。因此,它在获得一个系的额外补贴的同时还有机会享有由跨学科项目模式提供的合作。⁴²在第三章中,我将讨论结构问题对改变传统课程设置运动的影响。

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中心

妇女学研究生工作起步很早,现在已经比较完善了。1970年,中心在辛辛那提的一所大学,联合学院,该大学面向全国开设各种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在它的跨学科科目中加入了妇女学的“重点”。萨拉劳伦斯(Sarah Lawrence)学院1972年开始设置妇女史硕士课程,同年乔治华盛顿大学也第一次设置了妇女学硕士学位。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Clark Atlanta University,当时称为亚特兰大大学)1982年开设了一个非洲妇女学的文科博士学位。根据全国妇女学协会的报告,到1994年为止,三十八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有了妇女学研究生科目,大约有十四个院校有独立妇女学硕士学位,另有五十多所院校设有以妇女学为侧重点或主干的联合硕士学位。有三所大学提到,他们设有“妇女学”跨学科博士学科,另外还有二十多所大学提到,他们在一个或多个学科的博士学位中设立了妇女学副修或侧重。⁴³1995年五月,一个妇女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会议在加拿大安大略的约克(York)大学召开,安大略约克大学1992年开始设置独立的硕士生学位和博士生学位。到1996年时,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Clark)大学、亚特兰大州的埃默里大学、约克大学,以及在北美的三所大学都有了跨学科妇女学博士学位,最近,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和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两个大学的博士学位方案于1997年获得批准。北克罗拉多大学(Northern Colorado University)则

设立了妇女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

1997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召开了妇女学行政领导人大会,研究生教育成为大会讨论的重点。来自中西部和东部主要研究型大学的代表们指出,他们学校正在进行申报博士学位的工作,她们提供的信息肯定了1997年一项关于妇女学领域的调查,该调查的作者宣布,“妇女学博士生项目正在光荣地扩大发展。由约克大学的安·施黛尔(Ann Shteir)所撰写的这个报告把密歇根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加入到有特别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学名单中,并且还提到,爱荷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设立跨学科博士学位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马里兰大学也宣布了类似的计划。”⁴⁴现在,许多其它大学的妇女学项目都有了博士学位副修课程,博士课程证书,以及大量可供博士生选修的课程。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毕业时获得了妇女学学士或硕士学位,并且很大一部分(一项研究表明是大部分)将继续深造,因此对博士学位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在发展博士学位项目的过程中,大学教师们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思想、政治和经济问题。根据他们对以学科为基础的教育和关于跨学科性的界定等观点,他们可以设想出独立的学位项目或同其他联合授予学位的项目。他们可能要求学生先从传统学科获取一个基础学位、甚至是预备性学位并且/或者修完该专业的博士生课程,如同埃默里大学的做法;或者象克拉克大学那样,要求学生必须在一个或几个多学科宽阔领域,如地理、环境和发展,语言、文学和艺术,历史、心理和社会等系选修高级讨论班或其它课程。

有关学科方法的作用和跨学科对知识生产的贡献这些根本问题,在决定博士学位种类和设定学位要求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样起作用的还有销路问题。在亚利桑那大学召开的会议上,一位行政领导这么问道:“我们自己是否会聘用持有跨学科专业学位者来我们的大学教书?”作为爱荷华大学博士申报计划过程一部分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的三年期间,《高等教育记事》和《妇女书评》(Women's Review of Books)刊登的招聘广告中,平均有五十个是妇女学专业的教授。爱荷华大学妇女学系计划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博士生课程要求,要求要修满不少于七十二个学时的研究生课程,其中包括七门核心课程、一些选修课和至少十八个学时的专业课程。在教员方面,该系有六位“正式任命的教授”,四名“会员教授”,四十八位文科各专业的“兼职教授”,外加七名其它学院的教授。设计者们以充足的理由提出,爱荷华大学“有望培养出该领域首批并且是最优秀的博士”。⁴⁵

通过妇女学博士学位项目,该领域的界定和回答(跨)学科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有所进展。相同的,在传统教学方法与创新教学方法、新的研究与教学法、运用实习和实际操作学习,以及处理管理和结构问题的战略方法都将在妇女学中备受关注。如其它正在发展的(和已经成熟的)专业一样,妇女学也会在规范和标准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当然,它在多大程度上会走传统道路这一点无法预言;但正如亚利桑那大学大会上一名行政领导所说的,妇女学项目应该按照研究型系科的惯例,参加全国性评比,这反映了妇女学领域的学术领导人追求的新目标。

这些发展对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有关妇女的研究并不是新的。正如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所说的:“有关妇女的、由妇女提出的和为妇女设置的课程有着长期的学术历史。”她特别指出了两门“传统”课程,家政学和社会服务,然而她同时还指出这些课程与女权主义的方向有所不同。甚至,女权主义妇女学这门多学科的、关于妇女的综合性课程也有其先例,即大约在1902年由索雷-达尔克夫人(Mme. Souley-Darque)在巴黎社会科学文学院(College libre des sciences sociales)开设的“女性学”(feminology)课程。⁴⁶然而,除了这些教授有关妇女新知识的成千上万门课程外,前所未有的事业当然是致力于开展妇女学的研究工作,在学术会议上探讨妇女研究,在得到认可的主流期刊和更新的评论上发表这些研究,并把这些研究保存在图书馆和通过传统和新的媒体传播这些研究。妇女学的学位,在博士学位为最高,标志着这些量变要求构建新的教育蓝图。妇女学课程在全国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一个广泛的院校基地的发展。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Women)就是指导妇女学成长的机构之一。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它把自己当作“能够改变妇女和女孩生活的主要信息来源”。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把二十四个州中的七十五所研究中心、委员会和项目,以及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十四个组织作为其成员,其中大部分组织都是在1970年后建立的,并且附属于高等教育机构。根据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的一次调查，它们支持和赞助一千多名研究和工作人员，掌握着三十五万美元的中间预算。⁴⁷

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最老的成员之一，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学院的玛丽·英格拉哈姆·邦廷(Mary Ingraham Bunting)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它的建立是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妇女为获得高等教育的斗争为基础的。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女博士的高退学率引起了“科学人力资源”研究项目的关注，帮助1960年被任命为拉德克里夫学院院长细菌学家邦廷博士筹集到一大笔资金，用以建立一个新学院，支持由妇女进行的（而不是关于妇女的）独立研究。邦廷研究所已资助了大批驻校学者所做的有关美国妇女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基础是1943年创办的有关美国妇女史的拉德克里夫学院亚瑟和伊丽莎白·施莱辛格(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图书馆的资料。⁴⁸相邻的威尔斯利(Wellesley)学院妇女学中心成立于1974年，它利用该研究所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重视实用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它所出版的许多研究论文和召开的大会都关注就业、劳动力种族融离、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等问题。文章的作者和项目主任名单中许多都有重要的政府职务。建立于1971年的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伊格尔顿(Eagleton)政治学院的“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以及建立于1972年华盛顿的妇女政策研究中心也是这样的。⁴⁹

在全国范围内，斯坦福大学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成立于1974年（当时的妇女研究中心），该研究所提供了一个以大幅度跨学科妇女学为重心的研究模式。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的成立，直接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该中心是福特首次赞助的十几个研究中心之一，目的是建立一个坚实的妇女学研究基地。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以校园的一间屋子为中心，建立了斯坦福的教职员们的机构的资助和一个总部，以及一小部分核心“附属”学者和一批轮流的访问学者，这些学者的数量已达约二百人，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网络。她们的工作以研讨会、讲座和大会的形式由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向学术界和社区的听众提供。除了更多具体的帮助（如图书馆、事务性和研究性的援助），这些学者们还有一个相互支持的学术群体，这是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玛丽娅姆·张伯伦(Mariam Chamberlain)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她认为，“在研究中心成立的早期，当学术群体对妇女学持敌视的态度时，相互支持具有特殊的重要性。”⁵⁰

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所现在的花名册反映了学术界的變化。它包括一名古根海姆(Guggenheim)成员，德高望重、担任过特聘要职的学者，获奖书作者，和至少一名大学校长。这个研究所的资金分别来自斯坦福大学，以及各大公司、基金会和个人、许多商业、教育和工业领域的重要代表等。大量的论文、书籍和学术期刊的特刊都是在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所的资助下出版的。该研究所的全国顾问委员会以及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准成员”团体都尽力地在扩展它的活动范围，让广大读者能够读到本所学者的著作（参阅第九章）。

另一个福特基金会的受益者是位于亚利桑那大学的西南妇女学所(SIROW)，成立于1979年，是一个地区的中心。这个研究所现与六个州的三十所大学和北部墨西哥的两所院校都建立了联系，带领这些院校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农村妇女、女奇卡诺人、美国本土妇女，以及西南部和边界地区的其它妇女。该所还吸引了众多的联邦和基金会的拨款，使它能够赞助大量的研究、活动和出版物。⁵¹历史上第一所黑人院校的妇女学中心，斯佩尔曼(Spelman)学院妇女中心从福特基金会和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Charles Stewart Mott)基金会获得首批援助资金。1988年福特基金会建立了一个具有竞争实力的拨款项目以支持成立少数民族妇女学的机构。

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NCRW)的张伯伦，她既是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又是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的高等教育妇女工作小组组长。艾莉森·伯恩斯坦(Alison Bernstein)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但她长期以来与主要的私立和公立基金机构有联系，最近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的副主席。1992年她们俩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追溯了慈善事业对妇女学出现的影响。她们肯定了福特基金会，以及其它推进民权和教育的机构和个人对妇女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他们通过资助活动，以表彰和物质奖励的形式，使“妇女学只是昙花一现，长久不了”的预言破灭。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课程改革，是外国领域研究和黑人研究的早期推动者。它还显示了自四十年代以来对妇女机会的关注，并于1970年在它自己的单位中开始实施扶持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政策。1972年它建立了一个全国性项目，以资助教师和博士生进行有